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十七卷)

[清]焦 循(1763年~1820年)

[清]阮 元(1764年~1849年)

[清]章学诚(1738年~1801年)

乾嘉汉学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下)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9 - 6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8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清]焦循、阮元、章学诚乾嘉汉学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39 - 6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 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三辑·第十七卷

[清]焦循阮元章学诚嘉义学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下)

下 篇

章学诚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

| | |
|-------------------------|-------|
| 十八世纪汉学的前驱者 | (183) |
| 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 (208) |
| (一) 章学诚史学 | (208) |
| (二) 章学诚的历史理论 | (229) |
| (三)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 | (245) |
| 章学诚的教育思想 | (261) |
| (一) “道”论和实学教育理想 | (261) |
| (二) 教与学的本质 | (265) |
| (三) 治学论 | (269) |
| 《文史通义》教育思想评析 | (274) |
| (一) 关于经与史的关系 | (276) |
| (二) 关于经与史的学习目的与态度 | (278) |
| (三) 关于博约与学思问题 | (281) |
| 章学诚教育文论选读 | (284) |
| 易教上(节选) | (284) |
| 原学上 | (285) |
| 原学中 | (286) |

| | |
|---------------------|--------|
| 原学下 | (288) |
| 博约上 | (289) |
| 博约中 | (290) |
| 博约下 | (292) |
| 天 喻 | (293) |
| 师 说 | (295) |
| 博 杂 | (297) |
| 杂 说(节选) | (299) |
| 郑学斋记书后 | (301) |
| 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节选) | (302) |
| 答沈枫墀论学(节选) | (306) |
| 答周篔谷论课蒙书(节选) | (310) |
| 再答周篔谷论课蒙书(节选) | (310) |
| 家书四 | (312) |
| 家书五(节选) | (312) |
| 原道第一(节选) | (313) |
| 文学叙例 | (313) |
| 清漳书院条约一 | (315) |
| 清漳书院条约二 | (317) |
| 清漳书院留别条训 | (318) |
| 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 | (342) |
| 论课蒙学文法 | (345) |

下 篇

章学诚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



十八世纪汉学的前驱者

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清初学者虽然也有考证训诂之学,如顾炎武和黄宗羲在音韵学、“易”学上有他们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以为烦琐自此已有其历史阶段。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隐形式的以至为清朝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汉学。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黄宗羲戒万斯同北上语)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当时学者也有到了京师的,但也正如章炳麟所说的“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蹕善矣”(“检论”卷四“清儒”)。这时的学者中也有如毛奇龄以博学干禄的,又有如阎若璩、胡渭被皇帝赐坐称“先生”,或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而视为殊宠的,但这些人多为史家所讥,他们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民性的。因此,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当追源于顾黄诸人。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四年)、胡渭(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讲起,而将黄宗羲、顾炎武列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皮锡瑞非之,则多见其曲解误会。皮氏说:

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

真知灼见……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经学历史”）

实在讲来，江藩并没有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阎氏“考证之学，未之或先”（经部“书”类二），是为的评。清儒多把顾阎并称。如章学诚论考据之学，就有“宁人百诗之风”（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篇”）的话。章炳麟论清儒先进，也说：

始崑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检论”卷四“清儒”）

梁启超更以顾阎同列一章，尊阎尊顾，同等视之。这都不是史家的正确论断。阮元虽辨顾炎武以经学名家，然他不能不婉转说出顾氏所以异于所谓汉学家的所在。他说：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窻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阎若璩字百诗，他是顾、黄的后进，是真正进入考据狭路中的人。他的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后来戴震亦采“疏证”二字名其孟子研究），把宋以来致疑于“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说，有条有据地证实，并证明“孔传”亦伪。他说“孔传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戴震说：

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这种善读书的方法，正是乾嘉汉学家“读书”（仅于读书）的传

统,章炳麟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检论”卷四“清儒”)者是。阎若璩又有“四书释地”一书,谓“孟子谓读书当论其世,余则谓并当论其地”(“河,河内”条),校正了前儒关于古地名傅会的错误,这也是乾嘉学者舍世而论地的传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却是论世之著作)。他对于宋儒的冥求义理,虽没有批评,但敢于证朱熹读书之误:

又尝举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误,如季文子始专鲁政不待武子,子纠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孙,武丁至纣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阳败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处见“说苑”非“家语”,农家者流见“汉书”非史迁,去鲁司寇则适卫而非适齐,……颛臾近也非远人之谓,鲁有少施氏则孟施当亦有氏,不当以施为语声。闻者叹其精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阎先生若璩传”)

这种方法正为后来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的命题所本(如他说,不研究小学、地理、算学等学问,不敢治六经),更后演进而至阮元的历史考证。

与阎若璩同时友善而也是一个“善读书者”,是胡渭,字窺明。阎若璩的考证在“古文尚书”,胡渭的考证在“禹贡”、“易经”与“洪范”,他著有“禹贡锥指”一书,大旨如钱大昕所说:

先生素习“禹贡”,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荣波既猪,波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依经为训,章别句从,名曰“禹贡锥指”。(同上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易经”一书为宋人玄谈的根据。所谓“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清初黄氏兄弟与王夫之已经证其为陈抟的伪作。胡渭著“易图明辨”,更由宋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讖纬学的根源。他的“洪范正

论”，驳汉宋儒者的五行灾异之说，破除非理性的傅会。其要旨如钱大昕与江藩所述：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又言，“洪范”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范”之理通于“易”……，害二。“洪范”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徵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傅，移皇极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五福六极之传，害三。（“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与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胡渭传”同文）

毛奇龄（公元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年）也是当时的一位汉学家。他有忠臣不死节说，全祖望会痛斥之。祖望更说他的著作“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鲒竑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但他对汉学的提倡亦影响颇大。李奇走入考证的途径，即受他的推动。阮元更推崇他为汉学开创之功臣，说：

检讨（奇龄）……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窥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追溯太极河洛在胡窥明之先，发明荀虞于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

书”所辨正尤博。……至于引证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愈经室二集”卷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

奇龄有一部“四书改错”，是声讨朱熹的书。他说：“‘四书’注无一不错，……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以作八股，又无一不错，……铸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之错矣！”他攻击朱注的露骨，在颜元戴震之上，但后来因康熙帝升朱熹配祀孔庙，他便把这部书的板自斧了。

从考证的本身说，阎胡毛等人也有他们的个别贡献。例如，阎氏证“古文尚书”之伪，推翻了道学家十六字心传在经典上的依据；胡渭的“易图明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毛奇龄攻击朱注，也可以说是打击了经注上的偶像。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主流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毛奇龄以此干禄，固无足怪；清帝对于阎胡，给以钦赐的种种荣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大，字充宗，万斯同，字季野，世称“二万”。斯大以经学著名，斯同以史学著名。按照宗羲的学风，治经治史本来都和他的经世之学有关联的，但斯大的治经方法，实开后来专门汉学的方法论的先河，而斯同对于史料整理的态度，则对后来章学诚的文史学有显著的影响。

斯大深通三礼，辨“周官”之伪，对于后来“礼”经历史地位的怀疑，贡献颇大。他的治经方法，黄宗羲甚为称赞。宗羲在“万充宗墓志铭”中说：

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悟

传注之失? 学者入传注之重围, 其于经也, 无庸致思, 经既不思, 则传注无失矣, 若之何而悟之! 何谓以经解经? 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南雷文定”前集, 卷八)

这里在方法论上讲来, 不盲从, 重裁断, 比较归纳, 以经文的实事以求是, 而不以传注的心传来傅会, 这是朴实说理的传统。他对于傅注的不信任态度更为戴震以至阮元的训诂注疏的前导。

斯同晚年与李奇甚契, 颇受颜元学术的影响。他的最大著作为“明史稿”, 刘继庄对他说:“不如与我归, 共成所欲著之书”万先生诺之, 然不果。……及万先生卒于京, 其书亦无存者。”(“鮚菴亭集”卷二十八“刘继庄传”)斯同的“明史稿”, 后来被王鸿绪所盗, 钱大昕已指出:“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 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钱大昕叙斯同史学说:

先生……尝曰:“昔迂固才既杰出, 又承父学, 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 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史, 仓卒而成于众人, 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 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 惟恐众人分操割裂, 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 非事信而言文, 其传不愿。……俗之偷久矣, 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 而其传各异矣, 况数百年之久乎? 言语可曲附而成, 事迹可凿空而构, 其傅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 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少馆于某氏, 其家有列朝实录, 吾读而详识之, 长游四方, 就故家长老求遗书, 考问往事, 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 靡不网罗参伍, 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 直载其事与言, 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 核其言而平心察之, 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 事之端或有所起, 而其流或有

所激，则非它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从上面关于史料整理的这一段话看来，斯同对于历史学的论断，是有一定价值的。他在这方面，实上承黄氏的史学传统，而下开章氏“文史通义”之端绪。

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这和清封建统治势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

康熙以来的反动的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卷四“哀焚书”），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的编纂，至

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升化了经世致用之学,削弱了清初的知识武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事略状”,乾隆壬午。)另一方面,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为受清廷对外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因此,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潮流。皮锡瑞说:

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清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嘉庆八年,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经学历史”)

所谓御纂诸书,如康熙所纂的,多出于李光地诸人之手。章炳麟说:“李光地……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贵训诂,即稍稍理故书;贵文言幽眇,即皮傅‘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卒以是傅会得入主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

君臣相顾欢甚。……时令参订朱熹书，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检论”卷四“许二魏汤李别录”）

李光地承旨编纂了一大批书（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更上书颂扬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说：

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益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榕村全集”卷十“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李光地所颂扬的统治阶级的“统”策，即康熙以来束缚学术自由发展的法宝，所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痛斥说：“君家相公（李光地）之书，其貌则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鮚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

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钦定御纂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这正如皮氏所说：“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经学历史”）

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惠栋字定宇，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一七五八年）。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戴震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

戴震的学问从惠栋处所得者甚多，而其影响则超过惠栋。钱大昕曾为二人作传，对于惠栋说：

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宋元以来，说经之

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陈传”)

对于戴震说:

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阎百诗、顾景范、胡窥明虽善读古书,犹未悟斯失(指考证字义地名),先生始厘正之。同时颇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赞成其说。(同上“戴先生震传”)

吴皖二派不同的地方,过去学者或以为惠求其近汉,戴求其近实。王引之即持此种见解。他说:

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见“致焦循手札”)

章炳麟评述二派则说:

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子箴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筜、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继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笄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诂诂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笔密严范，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检论”卷四“清儒”）

炳麟的述评，是有一定的总结性的。他评论惠栋与戴震两派学风，吴派是“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吴派“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则“分析条理，皆笔密严范，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这是清末最后经学大师的评断。但严格讲来，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

汉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史料的一种方法。“汉学”二字，在吴派学者的概念中，确有“惟汉是信”的意思。例如吴派学者江藩说：

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搏、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羲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胡窥明（渭）“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于伏生也，……是以黜之。（“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

“不宗汉学，非笃信之士”，即章炳麟所谓“笃于尊信，鲜下己见”。但皖派戴震的意见稍有不同，他不但信汉，且也疑汉，即炳麟所谓“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戴震说：